

唐宋类书中保存的书学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彭砺志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类书是古代著述的一种特殊类型, 其中保存了前代大量有价值的佚书佚文。本文通过对唐宋类书中有关隐性书学文献的统计、编目、比勘、举例和分析, 旨在揭示这些文献对于文献学和书学研究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唐宋类书; 书学文献; 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38-07

唐以前存世的书学文献, 主要集中地保存在唐宋时期几部主要的丛纂类书典籍《法书要录》、《墨池编》和《书苑菁华》之中, 然而由于以上诸书的编选体例和取舍标准不同, 先期书学文献仍有不少遗漏, 如唐宋史志目录中的一些书目就不得其详。所幸唐宋类书中保存的大量脱文佚篇, 为我们研究中古书法艺术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对于这类文献的整理, 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有所辑佚,^①但因过于分散, 且时有疏漏, 致使专门研究者不易集中观览和利用。张天弓先生近制《秦汉魏六朝隋主要书学文献一览表》,^②综括群书, 沾渥学林, 惜没有占尽类书中有关书学的全部材料。为此, 我们将唐宋主要类书中所保存的有关书学方面的文献以时代先后加以类聚,^③复与存世的书学典籍进行对照和比勘, 探明其数量, 区分其存佚, 辨别其真伪, 揭橥其价值, 以期引起学界对这部分隐性文献的重视和研究。

一

类书既是工具书的一大类别, 又是古代著述的一种类型, 它将群书中分散的内容按照不同类属要

此外, 诗赋类辑佚专著如逯立钦《先秦魏晋南北朝诗》、费振刚《全汉赋》、程章灿《先唐赋辑佚》等也有所涉及。《中国书法》2000年12期。

本文所用类书名称和版本依次为: 1. 虞世南《北堂书钞》, 天津古籍1988年。2. 欧阳询《艺文类聚》, 上海古籍1965年。3. 唐徐坚等《初学记》, 中华书局1962年。4. 白居易《白帖》, 《唐代四大类书》之一,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5. 宋李 等《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1960年。6. 宋李 等《太平广记》, 中华书局1960年。7.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中华书局1960年。8. 宋吴淑《事类赋》,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5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9. 宋王应麟《玉海》, 江苏古籍, 上海书店1988年。

收稿日期: 2007-06-04

作者简介: 彭砺志(1966-), 陕西乾县人。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文献的教学与研究。

求加以分类汇编, 以便读者集中检索和利用。唐宋时期是古代类书发展最为鼎盛的阶段, 文人政治的崛起, 使动用国家力量来编纂大部头类书成为可能, 出现了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为代表的古代“四大类书”。

和其它艺术文献在类书中的流变分布不同, 古代书法, 既是经艺之本, 又是文学表现的题材, 所以, 从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始, 就收有关于书法内容的材料; 且随着唐代书法的繁荣与普及, 书学文献的数量也在不断骤增, 这在唐宋史书《艺文志》经部小学著录中有所体现, 而唐宋类书中这方面的材料与分类益加细致完备, 如《太平御览》中“书学”已孳生到六卷之多, 《玉海》仅“御书”一项即列有两卷(卷33、34), 宋代甚至还出现了像苏易简《文房四谱》这样的专门性类书。^④

纵观综合性类书中有关书学的文献内容, 其基本构成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和书法相关的文房器具, 如笔、墨、纸、砚等, 类书中它多属于“文部”; 一类是狭义的书法类, 其内容包括字体书体、书家、书论等。由于书法是从日用文字中分化出来的, 故常别立为“小学”, 或与书、画等合类为“艺术”。文房器用为书之所托, 筋骨之寄, 历来为学书者所重视, 早在《笔阵图》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而“书势”的内容亦同样见于《文房四谱》之中; 同时, 器用也是书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 《墨池编》卷19、20即列有“器用”一类, 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后来亦将这两部分内容一并列入《字学典》之中。

《文房四谱》只辑录有关文房器具一门, 其序云: “讨其根源, 纪其故实, 以参以古今之变, 继以赋颂之作, 各从其类次而谱之。”全书以笔砚纸墨分为四部五卷(其中笔为二卷), 每部类分叙事、之造、杂说、辞赋四项, 笔部多“笔势”一类。《文房四谱》内容多为《墨池编》所采。

在以上两类之外，书学文献中还有一类更易为人所忽略的有关古代印学（玺、印、绶）的文献。与前二类性质不同，在类书中它属于“器物”或“礼

仪”的范畴，多数后被清初朱象贤辑在《印典》一书中。（表 1. 书学文献在唐宋主要类书中的分布）

图 1 书学文献在唐宋主要类书中的分布表

类别 类书	文房器用	文字、书体、书家	玺印
北堂书钞	艺文（卷 104）		仪式（卷 131）
艺文类聚	杂文（卷 58）	巧艺（卷 74）	
初学记	文部（卷 21）	同左，“文字”小类	器物部（卷 26）
白氏六帖	卷 4（相当器具类）	卷九（相当艺术类）	卷 4（相当器具类）
太平御览	文部（卷 605）	工艺部·书（卷 747、9）	仪式部（卷 682、3）
太平广记		书（卷 261、9）	
册府元龟		总录部·笔札（卷 861）	
事类赋	什物部（卷 15）		
玉海		艺文·小学（卷 44、5） 御书（卷 33、4）	

分类的不同，体现了书法文献的不同来源及其与社会生活的纷繁联系。书法最早渊于小学，而小学附属于经学，因而书学又被混称为小学。魏晋书学形成后，又常与书画等文献并列为艺术（或“杂艺”、“工艺”）。^①文房器用，是古代文士不可须臾而阙的书写用具，“濡翰之为用，诚词家之为用也”。^②赞赋诗文咏物言志，是这类题材的共同特征，此故类书分类中它们常与辞藻文章相提并论。至于玺印，虽关乎金石书法，但因其材质、形制、功用首先代表着不同的等差秩序，在文人印兴起前，与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反而更为密切，恰如《北堂书钞》卷 131 所引《玉玺谱》云：“玺，印信也。在君则封册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在受职君上，显用下民。”东汉李尤的《印铭》亦言：“虎龟螭鼻，尊卑有常。”所以，从类书分类的角度，这部分文献自然被列入“礼仪”类之中。大概由于书学一门在类书中类别殊途的缘故，其中的器用、印学这两类文献常被研究者所忽略。

从类书所引有关书学文献的内容来看，在狭义的书法文献而外，有的重在征事，此部分材料多数来源于史籍；有的重在典故，关乎书论者为多；而有的则重在文体，表现对象往往以器用、书体为题材。从篇幅来看，有的只语片言，有的则庶近完篇。下文我们列的书学类文献名目，不论其文体与篇幅，凡在篇题（偶尔是内容）上涉及上述三方面书学内容、且首次在类书中出现的单篇，均被纳入我们考察的范围。

（表 2 唐宋类书所见先唐书学文献一览表）

时代	作者	篇名	类书	备注
汉	崔瑗	草书势	初学记、玉海	《初学记》作《草书体》。
		篆书势	艺文类聚、初学记、玉海	《初学记》作《篆书体》。
			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事类赋、文房四谱	
			与人书	北堂书钞、初学记
	李尤	笔铭	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砚铭	初学记、文房四谱	
		墨研铭	初学记、太平御览、文房四谱	《太平御览》作《研墨铭》
		印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	
	胡广	印衣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	
		进绶笥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	《初学记》作《笥铭》
	张衡	绶笥铭	初学记	
	繁钦	砚赞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房四谱、事类赋	
		砚颂	北堂书钞、初学记、文房四谱	
魏	韦诞	奏题署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房四谱、事类赋	引自《三辅决录》，《全三国文》题作此名
		笔墨方	初学记、文房四谱	有时被分引作《笔方》《墨方》
	钟繇	隶书势	初学记、玉海	
	王粲	砚铭	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事类赋	
	曹植	长歌行诗	北堂书钞、文房四谱	诗中有“墨出青松烟，笔自狡兔毫”句
	傅选	笔铭	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程申伯	相印书	北堂书钞、太平御览	并见《隋志》著录
	杨泉	草书赋	艺文类聚、玉海	
晋	索靖	书势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海	《墨池编》题作《草书状》，《书苑菁华》作《叙草书势》
	成公绥	隶书体	初学记、玉海	《太平御览》作《隶势》
		弃故笔赋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房四谱、事类赋	

参见彭砺志：《古代书画的目录学源流及其特点》，《美术文摘》2004 年 4 期。
《事类赋·笔赋》卷 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75，子部·类书，第 445 下。书目文献出版社。

	卫恒	四体书势	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元龟、玉海	
	嵇含	笔铭	文房四谱、事类赋	《全晋文》失收，《先唐赋辑佚》亦失之。
		笔赋序	文房四谱、事类赋	
	虞预	请秘府纸表	北堂书钞、初学记、文房四谱	
	王隐	笔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事类赋、文房四谱	《北堂书钞》题为华恒《鹿毛笔铭》。
	傅玄	鹰兔赋	初学记、文房四谱	
		笔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文房四谱、事类赋	
		笔赋	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傅子·工巧	北堂书钞、初学记、文房四谱	文及笔雕之工
		砚赋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事类赋、文房四谱	
		水龟铭	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印铭	北堂书钞、初学记	
		纸赋	初学记	
		杂诗	北堂书钞	弹篇握素管，弱纸含柔翰
	傅咸	纸赋	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文房四谱、事类赋	
	郭璞	笔赞	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刘劭	飞白书势	艺文类聚	《书苑菁华》作《飞白书势铭》
	徐安子	五十八体书势	玉篇	《墨薮》开篇有后汉徐安子
	王羲之	笔经	初学记、太平御览、文房四谱、事类赋、艺文类聚	《事类赋》一引作王《笔法》
		自叙草书势	太平御览	《墨池编》无作者，《菁华》作梁武帝《草书状》，有异文
		与谢安书	文房四谱	书中有“笔恶殊不称意”句
	葛洪	西京杂记	北堂书钞、初学记、文房四谱	书中有论汉“天子之笔”一段
宋	羊欣	笔阵图	玉海、太平御览	
		笔法	太平御览	
	鲍照	飞白书势	初学记、玉海	《书苑菁华》作《飞白书势铭》
	王僧虔	文字志	初学记、玉海	《法书要录》存有原书目录
	顾雅	古砚铭	北堂书钞	
齐	王僧虔	名书录	太平广记	
		图书会粹	太平广记	
		书赋	艺文类聚、玉海	《墨池编》《书苑菁华》收录
	萧子良	古今篆隶文体	初学记、玉海、白孔六帖、艺文类聚	
		答王僧虔	文房四谱、事类赋	
梁	梁武帝	砚铭	艺文类聚	
	萧子云	五十二体书	玉海	
	庾肩吾	谢东宫古迹启	艺文类聚	《墨池编》
		谢赉铜砚笔格启	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梁简文帝	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	艺文类聚	《墨池编》
		咏笔格诗	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咏纸诗	初学记、文房四谱	《初学记》《文房四谱》后梁宣帝
		笔语	文房四谱	苏言此书10卷，并自注：今书莫得见。
	徐搞	咏笔诗	初学记、艺文类聚、事类赋、文房四谱	
	刘孝威	谢赉官纸启	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事类赋、文房四谱	《太平御览》上官纸启
	丘迟	砚铭	艺文类聚	
	梁元帝	上东宫古迹启	艺文类聚	《墨池编》
		谢宫赐白牙镂管笔启	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江洪	为傅建康咏红笺诗	初学记、文房四谱	
	吴筠	笔格赋	艺文类聚、文房四谱	
陈	江总	借刘太常说文诗	初学记	

隋	薛道衡	咏苔纸诗	初学记	
	杨师道	咏砚诗	初学记、事类赋	
	岑文本	奉述飞白书势	初学记	
	殷元	笔铭	文房四谱	

根据我们对唐宋时期十部主要类书的统计，本期类书中保存相关书学文献近 80 篇（部），其中器具类 43 篇（部），书体书家 29 篇（部），玺印类 6 篇（部）。按照张天弓先生的统计，东汉以来书学文献不论真伪共有 102 篇（部），如果除去其中来源于类书的 20 例外，尚有近 60 篇书法文献未被纳入。由于类书的成书年代早，可信度高，其绝对数量甚至比《法书要录》等著录的文献还要多，这是以往书学研究不曾关注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唐宋史志目录的一些书目，如程申伯《相印书》，佚名《玉玺谱》、王愔的《古今文字志》、萧子良的《古今篆隶文体》^①、王僧虔《图书荃萃》等这些早已失传的书，赖此得见一麟半爪。此外，类书中还留有一些书（篇）的佚目，如梁简文帝《笔语》十卷同样也有文献学上的价值。总之，类书中凡此佚文脱篇不仅对书学，而且对文献学、文学研究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二

唐宋类书中保存的书学文献，多数在其它典籍中业已不存，整合这些文献，可以清晰复原自东汉以来书法文献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书法史、书法理论与书法文献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首先，这些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固有书学文献的题材、范围和内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古时期的书法史、书法理论史和书法文化发展史。

《法书要录》将东汉赵壹《非草书》作为书学文献的开篇之作，而《初学记》首次将崔瑗《草势》从晋卫恒《四体书势》中独立为单篇，并与其它杂势诸体一起，改变了传统“文字”分类的内涵和性质，昭示书法审美早在东汉中期已趋于自觉。对于印学文献，研究者多认为，其萌生的朝代要晚于书画理论。其实，如果我们对此类文献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其成书年代甚至比书法还要早。《北堂书钞》卷 131 引程申伯《相印书》：“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又印工养以法语程申伯也。’”《北堂书钞》还引《相印经》一条：“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欲得周正，上隆下平，光明洁清，如此皆吉。”《相印书》和《相印经》为同书异名，^②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一卷。由此可见，《相印经》是印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专业文献。

文房器具类文献在类书中归属于“文部”，而其书法史的意义常被文学所掩盖。过去我们常以“文房四宝”来概括之，据类书载录来看，其种类还应包括诸如笔格、笔床、水滴器、笔匣等名目。以笔格为例，梁萧纲、吴均、庾肩吾等人均有题名文章。从吴文“永临窗而储笔”判断，笔格的功用同于笔床，^③以庾启“管插铜龙”推之，其形制自古代簪笔而来，与后来笔架笔挂完全不同。《文房四谱》、《太平御览》中所列的“水滴器”，是用来向砚内注水的砚滴，有时连于砚首，“闭其上穴，则下穴取水，流注于砚中。”^④傅玄作《水龟铭》专言其巧工。

还有，过去我们对古砚材唯石质的认识，从傅玄《砚赋》看，在石材之外至少还有木砚（漆砚）、铜砚。“采阴山之潜璞，简众材之攸宜。节方圆以定形，锻金铁以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木砚髹漆即成漆砚，其使用者地位非同一般，《北堂书钞》引汉《东宫旧事》云：“皇太子初拜，给漆砚一枚。”此类实物见于江苏邗姚庄 101 号西汉墓出土漆砚。^⑤

器用不仅代表了书法在物质层面上的文化，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法艺术发展史的进程。东汉中期，草书的兴盛将书法推向艺术的峰巅，伴随着这一变化，笔墨类书写器具亦进入文人视野，新晋为他们笔下吟咏的题材。文人作为早期书法家群体，文墨兼善，自然熟悉器具的性能和工艺特点。如蔡邕为《笔赋》：“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曹植乐府诗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傅玄言笔性“柔不丝曲，刚不玉折”，这些诗赋的精美描写相继被战国以来出土的毛笔所证实。如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毛笔，竹杆底端镂成笔腔，笔头纳入其中，裹以麻丝，髹漆，合于蔡说。居延连云港出土的汉笔，弹性如初，证实傅言之不虚。同时，器具和书

基本相同，不过，长文所言与此稍有所不同，其言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由此可以看出，相印即相印经，《相印书》即《相印经》。

《艺文类聚》卷 58 引《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枚，铜博山笔床副。

《文房四谱》卷 3。

李则斌：《汉砚品类的新发现》，文物 1988 年 2 期。

此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

《三国志》卷 9《魏书》九传注引《魏略》文字，与此段

法一样,极尽巧饰之能事,“非文犀之植,必象齿之管”(傅玄)成为人们收藏玩赏的对象,“遂厕璇台赏”(梁简文帝《咏笔格诗》)。

反过来讲,当书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书家对笔、墨等自然开始有了视觉效果上的考量和要求。如类书记载中,蔡邕“非纨素不妄下笔”,感叹“良笔下士所无”,卫诞力主兼“三具”,王羲之与谢安书,抱怨“笔至殊恶不称意”^①,于是才有“仲将留神于制作”^②,亲自改良笔墨,笔墨之方,相印之法得以传后。以士大夫的身分传器具之法的文献还有:王羲之《笔经》、李阳冰《笔法诀》、柳公权《论砚》^③等。

书写器具类文献,与早期其它书论一样,“凡器为式”^④,理论上处处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色彩。不只是砚要“配法象乎二仪”,同样,墨也得“属阴自显于阳”^⑤,还有书纸“廉方有则,体洁性贞”,用笔“上刚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圆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等等。这些论说与蔡邕论书所言的“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傅玄论玺印“本立道生,归乎玄默”的生成论思想如出一辙,从侧面反映出先唐书法的本体论思想。

其次,这些书法文献有助于我们动态地考察书学文献发展时序及彼此间相互关系,对某些文献的作者、年代、真伪及理论等问题作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综合性判断和考证。早期文献篇章,虽标明作者有的仍难辨其实,如王羲之名下的《笔阵图》和《笔势论》,而作者含混者有的却反倒更易考定,这不能不归之于类书在文献考证中所起的作用。如《隶书势》的作者历来有不同归属,严可均将其等同于《四体书势》的作者卫恒,^⑥显然不妥。《法书要录》中张怀瓘《书断》卷上引该篇文字,注明作者为蔡邕。留意《初学记》卷二十一中有三条《隶书势》的内容,均注明为钟氏所作,显然是指魏钟繇本人,这与《书断》明显不合。《法要书录》和《初学记》同为玄宗朝所作,孰是孰非,我们只能从现存版本先后加以判断。《法书要录》目前采用最早版本为晚明时期的津逮秘府本,而《初学记》所据为宋元本,显然,《初学记》在版本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我们赞同钟繇所作还有一层上下文篇章语法上的综

合判断。^⑦

再如,今本《法书要录》注明为“齐王僧虔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因其文前别启歧义而变得扑朔迷离,学界争论不断。张天弓先生主张为王僧虔所作,其中就运用了北宋类书《太平广记》三条文同《采古来能书人名》却注“出王僧虔《名书录》”的材料,这无疑为推翻原来羊著提供了一条坚实有力的证据。^⑧另外,明代书法专门性类书王世贞《古今法书苑》中录此文,题为《齐王僧虔答录〈古来能书人名〉》,原启“寻索未得,续更呈闻”在此处则为“寻索有得,续更呈闻”^⑨,更释原文之疑窦。

《书苑菁华》所录蔡邕的《九势》、《笔论》,其真伪从来受到人们的怀疑。但若斥之为伪,《九势》阴阳生成、《笔论》中的“纵横可象”的思想均代表着先唐人的书法生成观念,有着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特点,这与唐后书论有着明显的分水岭,但据此便断定在唐以前,恐怕也难以成立。如《九势》中的笔法概念,在魏晋以来的文献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同样存在这样的疑问还有所谓的“八法”,《墨池编》卷三所言“自崔钟王传授”一定不可能成立。综观先唐人论书,主要强调书势的生成和审美,从这一时期众多的书体诸势文献就能看得出,王愔《文字志》目录即有“书势五家”。至于笔画、笔法、结字的观念,即使偶有,也与后世名称绝然不同。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从中我们还找不到与“九势”“八法”相同的用语。《笔阵图》中开始有了明显的笔画意识,但距离二者所述内容仍有不近的距离。由此可见,早期书论发展有一个从笔势到笔阵再到笔画结体转换的过程,从“势”到“阵”再到“法”,代表了从汉魏到六朝再到隋唐,书法由“势”到“形”发展的实际。“势”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其形象性审美是通过一种叫做“势”的文体表现出来。

梁任昉《文章缘起》有“势”一类文体,但后世所有文选没有以此分类者,^⑩因而有人怀疑其文

俱见《北堂书钞》卷140引。

《事类赋》卷15。

《文房四谱》卷1。

後汉胡广《笥铭》《进绶司铭》:伏以斯笥,凡器为式。

《文房四谱》卷1引《真诰》语。

《全汉文》卷80据蔡本集收入,并案曰:引篇当是卫恒作,本集有之,姑不删。

原文为:“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不难看出,主语为承前省略,《隶势》作者必钟氏无疑。参看彭砺志:钟繇作《隶势》考辨,《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2日,第七版。

张天弓:《采古来能书人名 质疑》,《书法研究》2001年3期。

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21《齐王僧虔录古来能书人名》。

丛师文俊对“书势”文体曾有所讨论,参见其《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一文,《提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5-306页。

体的可能性。而《艺文类聚》卷74单列一“势”，并与赋、启、书等并列，在“势”类文体下，有蔡邕《篆书势》、卫恒《四体书势》、索靖《书势》、刘劭《飞白书势》，显然，这是“势”类文体的类聚。可以说，势体文源于书体，归之动势之美，其文体上的特点我们还可以从类书中势类文的同篇异名来分析。《四体书势》中蔡邕《篆势》、崔瑗《草势》，在《初学记》中作《篆书体》《草书体》（后者一引作《草书势》）《晋书·索靖传》作《草书状》，《玉海》《太平御览》引之同名，而《艺文类聚》引作《书势》，题作王羲之《草书势》在《太平御览》中《书苑菁华》标题为《叙草书势》；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势或称“书势”，名称上“体”“状”“势”三者可以相互代替，语体上赋、赞、铭似无不可，或本乎于此，《书苑菁华》卷18列刘劭、鲍照同名《飞白书势铭》，“势”后加“铭”，明汪砢玉《珊瑚网》卷23将《篆势》、《隶势》作《小篆赞》和《隶赞》。二书均否认“势”作为文体的独立性，这完全是画蛇添足。

当然，类书中材料的真实性虽有助于我们考索书法篇章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但所有的材料未必都真实可信。如《白氏六帖》卷9“卫恒”条：“卫恒字巨山，善草隶，为四体书。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观者酬钱，计足而灭之。饮卫恒当作酬酒资。”这条材料明显有二方面失误：一是张冠李戴，误将师宜官之事安在卫恒头上，一是误将《四体书势》当作四种书体名称。

宋以后类书失误可能更多。如《太平御览》卷749称王右军《自叙草书势》，其实这只是宋人以讹传讹而已，《墨池编》按语据文中“二王父子可为兄弟”断言必非右军，到《书苑菁华》则又无厘头地竟将作者安在梁武帝名下。还有《太平广记》卷206“李斯”条，言自蒙恬的《笔经》。从李斯所言“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来看，必定是李阳冰后人所造的伪书。

复次，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辑录书学上那些已经散佚的典籍篇章及其佚文，或利用异文对今天存世的文献进行必要的校补。

唐宋类书的编纂，多数情况之下是奉敕而作，动用了当时国家藏书，资料极为丰富，况且，类书在辑录这些资料时大多引用原文注明出处，这为后代保存了丰富而翔实的书学资料。早在宋代，唐代类书就是书学典籍文本的重要来源。朱长文《墨池编》和陈思《书苑菁华》二书文体分类的做法，其中势、赋、启类不少篇目如杨泉《草书赋》、王僧虔《书赋》、成公绥《隶书体》等即摘自《艺文类聚》等类书。当后世一些书学典籍遗失之后，类书中所存的这部分材料又成了辑录亡佚古书篇目的唯一来

源。不仅如此，对于传今的一些篇目，由于在传抄版刻过程中脱误混乱，类书中的文字又可资校补。

亡佚篇目可分为二种情况：一是完全亡佚，和史志中一些古籍目录一样仅存其目，如《文房四谱》卷1载有梁简文帝《笔语》一书，注明“今书未见”，但从十卷篇幅来看，此书恐怕是先唐时期最为庞大的一部书学专著了，亡佚得实在可惜。二是部分亡佚，原书（篇）有赖类书中的片段只句得以窥斑，如《文房四谱》卷1有梁武帝《论萧子云书》一段，此段文字不见于其它载籍，难得对臣书相赏如此。^①如果佚文分散数处，加以辑佚，还可能知原书大略。《墨池编》卷3《李阳冰笔法》仅四句，言点画变化，而《文房四谱》除引此而外，还有四段佚文。可见，唐人的笔法，也并非狭义的概念。

萧子良的《古今篆隶文体》，《隋志》作萧子政《古今篆隶杂字体》，此书不见其它典籍引述。《初学记》卷21引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一条，叙诸体名称。《白氏六帖》卷9中又引得三条，《玉海》卷44中引二条，合观之，二书对传说中的垂露、龙书、鱼书、凤书、殳书、鹤头、偃波书的来由及特点作了交待，可与日本所见《篆隶文体》抄本相参。在萧子良的《古今篆隶文体》外，王愔的《文字志》也有三条保存在《初学记》当中，目前国内已有几位学者据此及其它诸书中的佚文做过辑录工作。^②

亡佚篇目文字具有辑佚价值，若有原书传世，二者相校，其异文同样具有校勘上的价值，尤其是其中的脱文，可用来校补。如《太平御览》卷951引《非草书》一段，略曰：“俯而择虱，不暇见地；仰而观针，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锐精于针虱也。”对比《法书要录》和《墨池编》该段文字：“俯而扞虱，不暇见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虬虱，”前文加点者，乃明显为脱文。

同样，还有成公绥《弃故笔赋》，对比《全晋文》卷59和《文房四谱》卷2《笔谱下》文字，后者较前多出二段文字，特别是“力未尽而弃之粪扫，有似古贤之不遇，于是收取洗而弃之，其用力而残其身焉。”一段，托物言志，点明主旨，赋、序两段文字界域昭然，从文中“答也”来判断，本篇赋作属于对话体结构。

有的类书中材料与原文二者虽然皆通，但明显有高下之别，可用来订正文字的异同，进而增进我

其文曰：“笔力精劲，心手相应。巧逾杜恕，美过崔宴，当与元帝并驱争先。”

张天弓《王 文字志 辑佚》，《书法报》1993年12月5日第42期第3版。张荣庆《王 文字志 考略》，《书法研究》1995年6期。王学雷《刘宋王 文字志 研究》《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文物出版社2002年。

们对原意的理解。如崔瑗《草书势》中一段文字，《晋书·卫恒传》为“旁点邪附，似蝓塘揭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捷毒缘幘。螭蛇赴穴，头没尾垂。”一段，《初学记》卷21引文为：“旁点邪附，似螭螭抱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幘缘幘，（若）螭蛇赴穴，头没尾垂。”类书中的螭螭（螭）较之原文中的蝓塘（即蜚）、山蜂较之杜伯（即蜎）明晰生动，特别是“看幘缘幘”四字，连下更能突出蛇缘幘缝，头没里而尾垂空的景象。

另如，《太平广记》卷207“王羲之”条，注明材料来自王僧虔《图书会粹》，张天弓先生以为该段文字与虞和《论书表》相同，表中遂断定为伪书，恐非是。细审文中王羲之逸事，与原表不合，尤其是张翼写表一事，两者的叙事角度不同，此事有助于我们对“题答”的理解。^①试比较：

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相看，乃叹曰：“小子乱真乃尔。”《论书表》

王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狭阔，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图书会粹》）

原来，穆帝看到王羲之自书与他的表奏后，差人找来与王书纸色、尺幅大小完全相同的一纸，让身边张翼照其笔迹临写一份，原件留下，只是在临本后面写上答复返与羲之，羲之接到后当时竟以为是自书的表书，后来才发觉有诈，故而有“乱真”之叹。

最后，这些文献是我们蒐集某一专题史料的渊薮，同时也可当作查考与书法相关词语典故的工具书。传统类书编纂要求以类相从，在同类专题之下汇聚着来自群书中的不同材料，有的还是今天已经不传的古书佚文，所以，利用类书来爬梳查考史实和搜集文献，往往事半功倍，省时省力。例如，我们要了解唐宋时期有关“书学”教育的史料，检索宋·章如愚《群书索考》卷32士门·书学，对其创始兴废便有明晰的线索：初创于隋，唐武德初废，贞观二年复立，高宗显庆二年又废。宋徽宗朝，崇

宁时于国子监置书画之学，各置博士一人，生员三十人。大观四年复以书学入翰林书艺局，宣和六年措置书艺所，生徒多至五百人。

“飞白书”是古代一种特殊的装饰性书体，为唐宋历代帝王所钟爱。《太平广记》卷206、《玉海》卷45集中了古代诸种书体文献材料，可按图索骥。而对于唐宋帝王御书喜用飞白体，打开《玉海》卷33、42卷“御书”，就能看到自唐太宗到宋嘉祐皇帝好写飞白书的有关史料。古代其它众多书家的史传材料，在类书中同样也大量存在。如《太平御览》之书类、《册府元龟》笔札类中，集中保存了宋前书家的史料，堪与张怀瓘《书断》、陈思的《书小史》相埒。

类书还有一个功用，用于检索与书法相关的诗词文章典故。如《笔阵图》开头有“夫三端之妙，莫重乎银钩，六艺之奥，莫乎银钩”之句，其中的“三端”和“银钩”二词作何解释？检《白氏六帖》卷九“三端”条：“君子有三端，文士之笔端”；“银钩”被释之为“书势”，复读原语，涣然冰释。

现在我们把书法家作品所得的经济收入叫“润笔”，润笔一词有其典故来源。《文房四谱》卷1杂说：“在昔受爵者必置贄于草诏者，谓之润笔。郑译隋文时自隆州刺史复国公爵，令李德林作诏，高宗戏之曰‘笔头干’，译对曰：‘出为方牧，杖策而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这样，我们对“润笔”一词的来龙去脉便有了根本的理解。

当然，类书中的资料毕竟是来自二手，宋以后类书转抄前代，可能还会出现三四手材料，因此，我们在利用时还需要尽可能地找原始资料进行必要的核对。

总之，重新发掘唐宋时期类书中这些隐性的书学资料，不仅是深入文献学研究的需要，更是对古代书法研究从史料到方法上所作的一次双重拓展，而将史料文献运用到专业研究之中，正是其学术价值的终极体现。

①参看彭砺志《六朝题答风尚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台湾）《中华书道》第42期，1993年5月。

The Documentary of calligraphy conserved In Tang-Song Books of Classification and It's Academic Value PENG Li-zhi

(Ancient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books of classification written in ancient are special kinds of books, it conserved a great deal of the valuable lost books and passages i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assage is to disclose the double meaning of these document for the study of document and calligraphy through the statistics, edition, contrast, example and analysis of the indistinct document of calligraphy in Tang-Song books of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Books of classification in Tang-Song; document of calligraphy; value of academic

（责任编辑：陈剑）